



薛正毅,不是政府官员,却在“政界”名气不小。本职干的是自动化工程师,出名却因为热心于公共事务。在事关群众利益的各类听证会、座谈会、质询会上,几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他的话有板有眼,直陈时弊,不少市民大喊痛快。但也有人听了头痛,对他最经常的评价是:“老薛这种人,没有他不行,太多了也受不了。”

□快报记者 赵守诚/文
快报记者 辛 一/摄

“平民大炮”薛正毅： 做梦都是到政府部门奔来跑去

谈对象促使他“被参政”

出生不久薛正毅就随父母定居上海,从在上海读书到在南京工作,他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,性格特别内向。埋头于图纸中,几乎不接触社会,不关心政治,甚至一天都不说一句话,开会也从来不吭声,在人多时说话就脸红。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时会逼他蜕变成“管事佬”。

同事帮他介绍对象,对方是医生,能说会道。交往几次,女方开起玩笑,“你这人真没劲,恐怕全南京也没一个朋友。”

薛正毅急了,“谁说的,怎么没朋友?”他想起父亲的学生夏先生在民革南京市委工作,父亲曾叮嘱,“有空去夏先生家坐坐。”薛正毅当即说,“现在就带你去一个朋友家。”夏先生与女友一样,都希望薛正毅改改性格,多了解社会,合力“逼”薛正毅加入了民革。

参加民革小组讨论会,每个人都要发言,这是薛正毅平生第一次公开讲话。腹稿准备好3句话,可临场一抖一慌,只憋出来一句,连忙声明,“先讲这么多,后面想起再补充吧。”还浑身冒汗,脸通红……

后来时间长了,薛正毅竟也被“锻炼出来”了,不但爱讲话,话还真不少。妻子打趣,“你现在整天不务‘正业’,开会时哪里话筒就坐在那,讲话只嫌时间短,开口就打不住,真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,怎么就像变一个人呢!”

五星红旗该怎么挂?

4月21日全国为玉树地震遇难同胞举行哀悼活动,降半旗志哀,薛正毅对此特别感慨。

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公民,他多次叫板违反《国旗法》的做法,让一些人下不了台。

《国旗法》第六条规定,政

府部门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。薛正毅走访发现,不少政府部门违背这一条,他当即提交政协提案。一位副区长做出书面答复,大谈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。薛正毅一看火了,“这是回避事实,答非所问,绕来绕去,还是一点没改。”他拒绝这种敷衍和马虎,高举《国旗法》闯进区政府,督促政府官员依法改正过来。

这是薛正毅第一次与政府官员打交道,此后,他再也不坐等政府的答复。在提交提案的同时,就主动找上门质询。他曾一连5次提交有关国旗的政协提案,督促政府官员加速整改。火药味最浓的一次,矛头直指市政府。

那是一次提高市民素质,迎接十运会的政情通报会。薛正毅拼命举手,抢着发言,他一开口台上政府官员脸就变了,“《国旗法》第12条规定,升挂国旗,应当早晨升起,傍晚降下。但市政府门前广场的国旗却只升不降,除非破了才降下来更换。开十运会,政府号召市民提高素质,但政府官员自身的素质也要提高。”这一炮轰得会议主持者很尴尬,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很快,市政府门前改为每天升降国旗了。

为这次发言,薛正毅做足了功课。他在深夜11点半跑到政府门口观察,直到政府大楼灯全熄了,国旗也没降,证明夜里根本不会降了,他这才回家。

“我写给副市长的信呢”

新街口原先有个棚户区,叫养济院小巷,政府公告要全部拆迁就地安置,可剩下81户迟迟未动。周边已成废墟,这些居民苦不堪言。薛正毅在调研后,给时任副市长的戴永宁写了一封信。信寄出第8天,还没回音。他找到市政府机要秘书处,“我写

给副市长的信呢?”工作人员一边看报聊天,一边回答说没收到。薛正毅拍桌子大叫,“怎么可能?我叔叔住在美国芝加哥,我寄给他的信7天就收到了,副市长住在玄武区,我从白下区寄给他的信,会8天还收不到?请再查一下,到底收到了没有?”

这一嗓子吼得还真管用,信当场就在一摞文件里翻了出来。“这事已批转给有关部门办理,你找他们吧。”薛正毅倔劲上来了,当即摸到相关部门,被3楼部门推到1楼部门,又被1楼推到3楼,最后终于查出原来是彩印厂想要这块地,但没钱,拆迁才停下来了。他不离不弃地跑了4个月,到11月底,一个个症结总算打通,居民如愿以偿,顺利拆迁并回原地安置。

这件事让薛正毅感到,公民维权实属艰难,必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干劲狠劲。

院长接待日为何看不到院长

数年如一日,老薛常到法院部门“潜伏”,爱打抱不平。某区法院被评为基层模范法院,每周四上午是院长接待日。一个周四上午,薛正毅来到这个区级法院,只见一张大桌子挡在楼梯口,保安坐在后面,正好有位老太太想找院长,保安不让进,“院长不在,领导都不在。”硬把老太太挡回去了。

“院长接待日把群众拒之门外,这不是忽悠人吗?”薛正毅上前理论,一位认识他的院领导出来了,态度很强硬,“我们法院不在行风评议范围内,请你离开。”薛正毅根本不买账,“院长接待日,请问院长为何不出来?”他指着墙上的钟,“我在这等他10分钟,他不下楼,我就去找市人大,问他们到底是怎么监督的?”

这招挺灵,两位工作人员领他来到一个法庭等待,让他坐在被告席上,对方坐在原告席和法官席上,用审问口气边问边记录,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薛正毅报出名字后,对方又问,“你家住哪里?”薛正毅不领这一套,站起来就走。对方看他动真格的了,赶紧叫来院长下楼……薛正义毫不留情当面质问:“你们这就是模范法院吗?”

一年提出120条意见

如今,薛正毅早已是许多政府机关的熟面孔,一些官员私下评价,“这人很较真,让人佩服。”也正因为此,他也被南京多个政府部门聘为行风监督员,这倒也说明了这些部门是真的希望他能帮助机关改进作风,尽管有时也会无奈摇头:“老薛有时候也真让人受不了。”

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许多方便设施,有的甚至是他大年三十半夜上街“调研”的成果。如公交站牌上没有夜间到站时间标志,乘客不知等多久。起初,薛正毅提出来,公交公司哼啊哈啊地磨,答复要研究研究。一个星期天,听说公司领导要去义务洗车,他也跟着来到下关码头公交车站。他拎着抹布擦洗,乘客呕吐物风干成饼,粘在地板上冲不掉,他就用手硬抠。公司领导看不下去了,感动地说,“老薛真不容易,你提的建议我们马上办。”很快,公交站台所有通宵车的到站时间都标了出来。

这样的事不胜枚举,大街小巷路灯杆上的公厕指路牌是他建议设置的;煤气钢瓶注明有效期限的小牌子是他首倡的;新街口大商场商品标志牌规范化;评事街小区出新后增加路灯……公交公司聘请20名行风监督员,1年里共提了190条意见,其中120多条是薛正毅提的。

对话

我太认真是缺点吗

记者:你是名工程师,同时又是政协委员,参与社会活动时,你觉得自己更多地属于什么角色?

薛正毅:不管是深入调研,还是潜伏政府职能部门暗访,抑或是直面叫板不作为的官员,我都把自己看作一名维护大众权益的公民代表,大声地为公民利益鼓与呼。这两年我因年龄原因不再做政协委员,但仍时刻关注公民利益。今年两会,我参加公民旁听,变过去持身份证参会为持身份证参会,目的一样。

记者:你日常关注的重点在哪?
薛正毅:一句话,就要监督、呼吁职能部门依法行政,不能侵犯公民利益。

记者:公众和媒体对你印象颇深的一点,就是你质疑不作为政府官员时,有理有据,咄咄逼人,常让某某长官下不了台,很丢面子。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?

薛正毅:我家的床头堆满大量法律法规书籍、规章制度文本,还有调研材料。有空就翻阅、学习和琢磨,目的是面对职能部门时问题提得更准,不仅敢讲话,话还要说到点子上。我经常在做梦时想起一句话,怕忘记了,爬起来记在本子上。

说来也怪,做政协委员的18年里,晚上做梦全与参政议政有关,吵啊、喊啊,在政府部门之间奔来跑去之类。可一退下来,这些梦全没了,梦中出现的全是学生、父母家人等怀旧的事。

记者:做政协委员18年,加上退下来后这两年,20年来你不停地奔走呼吁,向政府提意见和建议,最大感触是什么?

薛正毅:累,相当累。我的性格就是认真,咬定青山不放松。我的名字也寓意我的这个职责,正毅就是要求正义,要求公平。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,我要尽力让它照进每一个公民心中。

但说心里话,在现在的官场生态下,追求公平正义十分不容易。人家追求难得糊涂,可我偏要一清二楚,难哟。有朋友说我“优点是认真,缺点就是太认真”。在当前浮躁的社会风气下,太认真反而成了缺点,这很不正常。我觉得很累很累。

麻辣语录

关于机关作风

有次我去某个机关,还没到11点40分,工作人员已经盖着毯子准备休息了,这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生病了,生病了可以请假回家休息,为什么还在单位?机关明明中午到12点下班,但

普遍在11点半甚至11点15分,部分工作人员就下班去吃饭了,还有一些人摆桌准备打牌,打开折叠床午睡……

关于二桥收费站

这个收费站放在南端,进出八卦洲地区的车辆必须缴过桥

费,这大大地限制了八卦洲的发展,许多投资商都因为这个收费站,而最终放弃了来八卦洲投资。

关于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

中心的宗旨是科普,南京有几十万青少年,本来应该不愁人

气。问题是规划时选址比较偏,宣传又不到位,策划的活动太少。政府花了那么多钱,现在硬撑这个地方,其实是资源的巨大浪费。目前的票价偏高,二三十元的门票一家人来了会喊吃不消。如今这样亏损经营,要放在民营老板手上,早急得坐不住了。